

赵国历史文化沿革

河北省邯郸市

历史学会
出版
社

赵国历史文化论丛

邯郸市历史学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赵国历史文化论丛

邯郸市
河北省 历史学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 郸 地 区 印 刷 厂

787×1092毫米 1/32 11.625印张 24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50元

ISBN 7-202-00392-9/K·55

前 言

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9月27日至30日在赵国故都邯郸市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我国知名学者、邯郸市史学会顾问、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宁可先生和河北省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苑书义先生倡导的，是由邯郸市史学会、市博物馆、河北省史学会联合发起的，受到了中共邯郸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帮助。为了组织好这次会议，邯郸市委宣传部加强了领导。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赵文化的渊源和内涵

秦赵共祖，史有记载。在讨论中，有的学者首次提出赵文化的源头在少昊，并经商族的演进而分裂为秦、赵两支文化。也有的学者根据邯郸百家村战国墓中屈肢葬、壁龕和头西向等重要特征，推测秦赵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关系，但在同为商族后裔的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

对赵文化的内涵，认为赵文化不等于赵国文化，应包括赵建国前赵地土著居民文化和建国后的赵文化两个阶段，处在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点上，其内涵具有农

62781/48 01

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双重特征，这就造成了赵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气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制度上的独特风韵。

二、赵国的政治和经济

有的学者从政治制度、官吏制度方面论证了赵国政治的二重性，即既有官僚政治也有宗法血缘政治的双重色彩，并注意到了赵国以邯郸为中心的郡县制和代地的封国制的特点。还有的学者对赵与邻国的关系、赵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在对赵国官制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赵国的官制划分为中央、地方和家臣三个系统，并且通过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官制的比较，对各个系统的官制作了较详论述。

邯郸是赵敬侯以后的赵国国都，有的学者从农业、丝麻纺织业、金属冶炼业、商业和城市建筑以及兵器制造等方面，探讨了战国时代邯郸经济的发展。

三、赵国的思想与人物

对赵国思想的讨论，是会议的热点之一。公孙龙子的名家思想，曾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不齿，与会学者认为，对公孙龙子的思想要重新评价，并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他的“坚白异同”之辨。同时还提出，他的名学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山之祖，应给予应有地位。当然也应指出他在逻辑上的错误。

对荀子思想的讨论，一些学者用荀子的世界观与孔孟儒

学思想进行比较，提出荀子的儒学“标志着儒家学说从宗法性向封建性转变”的观点。另一些学者从荀子人学角度提出，“荀子自觉地把人与自然分开，把人与神对立起来，把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区别开来，从而奠定了儒家人道观的基本格调。”

对赵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会议的一个重点。这次会议至少涉及到了十几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们在赵史上的地位、功过进行了评述。

四、赵国的军事

有的学者从军事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赵国的发展过程，从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战役阶段等方面提出问题，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赵灭中山的军事活动，长平之战和邯郸保卫战，胡服骑射的改革问题。提出了赵国在军事上的成与败，与战国后期纵横战争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历史条件密切相联。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将骑马文化和旱地农业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化全局面貌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今天仍有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

五、赵国的疆域

有的学者认为，赵国的疆域逐渐由西向东向北发展。向东定都邯郸，占据富庶地方；向北形成以蔚县为中心的代地，为胡服骑射奠定基础。围绕疆域讨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赵长城问题上。

值得注意，有的学者从史地学角度对战国赵都中牟地望的传统看法提出怀疑，认为中牟应在邯郸的东南，黄河以北的地区。还有的学者提出，赵国的陪都即信官，今河北永年县境内的易阳城遗址即是赵的故信官。

赵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曾有灿烂的时代，在中国先秦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曾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做出过重大贡献。古赵地留下的许多珍贵的遗迹和遗物，受到历代史家的重视，因此，赵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刻地发掘，它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去深入地研究，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历史教益。

邯郸市历史学学会

1988年4月5日

目 录

前言	(1)
关于晋赵文化的共相和特殊相——兼论中国骑马文化 的源流	唐嘉弘 (1)
试论战国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	孙继民 郝良真 (36)
赵国的发展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周建英 (50)
赵、秦、商族源初探	孟世凯 (63)
赵秦墓葬的“共祖”现象刍议	罗平 孟繁峰 (75)
略论赵国兴起与强盛的军事原因	杨范中 (86)
赵国军事方略简论	房立中 (104)
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	石 泉 (116)
纵横战争与长平、邯郸两役的成 败	李氏 王健 胡海燕 (139)
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兵力质疑	邵服民 (154)
略论赵国政治的两面性	史建群 (158)
赵国官制渊源及演变	萧 秦 (166)
天时、地利、人和——试析赵氏立国智氏败亡的经验 教训	徐 勇 (185)
试论赵鞅尚贤用人路线的特点和作用	章启勋 (197)
奉阳君任相及相关赵史探析	徐少华 (209)

赵武灵王历史地位刍议·····	靳生禾(225)
沙丘之变与赵武灵王之死·····	何清谷 崔向东(238)
赵武灵王思想简议·····	张 文(246)
略论荀子对儒学宗法理论的革新·····	罗祖基(258)
试探荀子“性恶论”在当时社会变革中的进步 性·····	马 涛(270)
论公孙龙辩学的创新精神·····	刘宝才(275)
春秋战国时期邯郸经济的探视·····	邢春民(286)
从有关铭刻看战国时期赵之兵器冶铸手工 业·····	杜宇、孙敬明(293)
浅论战国时代赵与韩魏的关系·····	侯廷生(308)
先秦赵的疆域变化·····	雁 侠(312)
古高阙地望及赵北长城西部走向·····	夏子言(318)
试谈赵都邯郸故城形成、布局与兴衰变化·····	陈光唐(333)
赵国都邑迁徙考略·····	李兴河(346)
赵太后玺新释新证 —— 赵史笔记之一·····	林 杰(348)
浅析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人殉性质 —— 略谈 人殉与人牲·····	孙德海(362)
编后记·····	(366)

关于晋赵文化的共相和特殊相

——兼论中国骑马文化的源流

唐嘉弘

赵国是“三晋”（赵、魏、韩）之一，赵文化自然是由晋文化增殖裂变所形成的。无论是考古文化或一定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总是在运动着变化着。一个文化主体总是与其他文化不断的冲突与融合，总是在彼此渗透与相互传播之中。晋文化和赵文化同样如此，它们的主流应属华夏中原文化，支流则有不少异族的和草原部落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它们的文化层次的上层是华夏层，下层则为众多的异族部落层。而这两个层次并非一成不变，却在经常的渗透融合之中。传统史学所说的晋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这一类型的文化在政治经济上的反映。

考古出土材料说明，山西境内的先秦文化，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均颇有完整的系统性，按其发展顺序有仰韶、龙山、二里头（夏）、二里岗（商）、殷墟和西周、春秋、战国的文化层次和历史阶段。在这里可以看见古老的悠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情景。晋赵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由于赵文化基本上是从晋地文化所孕育，因此有必要对

晋地文化进行概括，以便明确赵文化源流演变的迹象。

旧石器时期的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及下川遗址等文化对赵文化的影响固然是间接的、遥远的，即使到了新石器时期和夏、商、西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也是并未起到密切的直接作用；应当承认，真正直接的起到现实作用的文化因素当在春秋战国时期去寻找，它们与赵文化有着密切的线索，清晰的联系。但是，三代及其以前的文化，确是我们进行纵向或横向结合及比较研究的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他们足以说明晋赵文化的源远流长。

赵国裂变前的母体——晋国的文化大量而广泛的是以中原文化面貌出现的，属于华夏系统，具有当地各族最高的文化、发达的文明和完善的国体。无论是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和西周诸阶段，无论是遗存中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建筑基址、墓葬形制等，都和同一时期的陕西、河南、山东有关文化基本一致，地方特色或异族特色并未占有主导地位。如果说“蛋形三足瓮”等是地方文化中有代表性的器物，加上其它带有地域性的器物 and 器物的局部（如纹饰、形制等），显然，从全面的整体观察，中原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远远超越地方特色。

从考古文化分析，当地晋地文化中，既有粗耕农业，又有一定的畜牧业（没有游牧业），而狩猎或采集业仍然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资料取得的手段；和其他中原古国一样，同属复合经济型式。

吕梁地区的保德、忻县、永和、灵石、石楼、平陆、柳林等地，发现商代中期以后的遗存，其中有部分与河南出土的相同，另一部分如觥、盃、靴、竖耳尊、铃首或蛇首刀、

剑、匕、牌及螺形金耳饰等，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含有一些北方斯基泰文化因素，多有河南二里岗和殷墟文化所未见的特色。

“北方古文化”当然包括陕北、晋北及冀北地区，无论就其区系类型或文献记载而论，其中肯定存在不少异族共同体或文化类型，它们所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无疑更直接更深远。晋赵文化的异族特色，应是通过这一民族走廊地区而来；在这个走廊地区，各族文化的渗透和传播，通过商业往来和战争掠夺以及通婚、政治结盟和各种原因异致的个人、家族、部落的迁徙，从来也没有停止。经常发生的文化交流，只是变换着不同的主体和客体而已。

晋赵毗邻的冀北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中，也并非单一的“纯种”文化。它们当属走廊性的南北交往的传播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明显地含有龙山文化因素，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标本测定距今 3965 ± 90 年，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发展时间约在一千年左右。迄今考古发现说明，至少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至燕山南麓，辽河以西至经棚、围场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代表这里青铜文化较早的遗存，大致相当于夏商时期，并不晚于黄河流域较早的金属文明。这一个别现象不会影响“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必须从全面的和整体的历史主义去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当在西周春秋时，有居住遗址，出土猪头骨、牛腿骨、经火烧过的石块等，个别墓葬出土人头骨或一马、二马或一狗殉葬。有些死者颈下佩带“鄂尔多斯”青铜器，有蹲踞虎形、蛙形、羊形等动物形象的牌饰，有各种形制的短剑、铜泡等；将这类文化定为山戎文化，似非毫无根据，但确无法

直接论证，仅系一种推论。肯定其中不限于一个氏族部落，也不限于一个族属的文化，至于辽西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文明性问题，似觉材料少了一点，不拟作过多的推断。毫无疑问，夏家店上层文化内涵中确实存在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因素；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有黄河文明渗透的迹象，发现了家畜猪、狗、羊、牛的骨骼，猪在几个发掘地点中个体统计的比率都较高，尚未有马的遗迹及骑马文化的出现。

春秋时代晋国晚期都城“侯马晋国遗址”应为晋都新田，它当为晋文化的一座丰碑。可分为早晚两期故城，发现手工业作坊，分别有铜器、货币、骨器、陶器、石器等，还有几批祭祀、盟誓、殉人遗址，以及附近的村落遗址和古墓群等。颇有意义的是在铸造铜器遗址内发现陶范三万余件，能辨认出器形的有一千余件，成组配套又能复原器形的有百余套，基本上掌握了当时陶范制模、翻范到浇铸铜器等一整套工艺过程。侯马盟誓遗址出土数千件朱书盟书和墨书诅辞，比较完整可以释读的约六百余件，确属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大体记录了公元前497年后以赵鞅为代表的晋国新兴地主势力为夺取权利攻击邯鄲赵氏宗族、中行寅、范吉射等所订立的约信文书。战国时期的赵文化和春秋晋文化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邯鄲故城当为赵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颇具代表意义。相传的“赵王城”，可能是当时的宫城。形制和规模都与侯马相似，由“品”字形排列的北、东、西三个小城组成，各个小城长宽一公里左右，墙基宽16米左右。赵王城内现有的夯土基址的体积之大和保存的完整，都是第一流的。在约十余

个土台遗存中，以西城中南部的“龙台”最大，长宽260米以上，高达19米；北面又有长宽五、六十米的两个台基，作等距离的一线排列；东城西部南北对峙的两个台基和北城西南部的台基，长宽都有100米左右。这些台基及其周围已湮没于地下的基址，都堆集大量瓦片，有的台基还发现柱础石，显然有一些大型宫殿式建筑。宫城的门阙已发现十一处，每个豁口均宽十余米，大多通向“龙台”等主要殿址，并且南北、东西遥相对应。赵王城东北另成一圈的大城作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宽约三公里，南北最长4.8公里，墙宽一般为20米左右。西北部转成斜角的“王郎城”一带地势较高，地面尚存高3—12米的残墙，其余绝大部分城墙早已淤垫在现今的地表之下，埋葬最深的地方7—9米始见夯土。大城之内发现有铸铁、烧陶和石器、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它的西南隅和赵王东墙北段相距不到100米，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探索。从二城的相对位置来看，邯郸的整体布局和临淄极为相似，即有一个规模稍小的宫城，紧邻再建规模较大的外廓城，只是邯郸的两城没有象临淄那样连成一体^①。

邯郸故城，按《汉书·地理志》注及《元和郡县志》等记载，该名称源于城廓东南五里有邯山，而城廓又在该山尽头之故。邯郸故城是战国名城，为当时黄河以北最大城市之一。也有可能，“邯郸”一词乃由草原民族称呼酋豪为“汗”的缓读或音转而来。《史记·货殖列传》按物产分布将当时天下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区域，邯郸正在此地区中心，既为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当时国内或国际市场的中心。经济地位和燕国的薊城、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城、郑国的阳翟、韩国的荥阳、三川的周二并列齐名。

“邯鄲倡”馳譽各國，是第一流的歌舞諧戲樂人，是官僚和豪門（富商、大地主等）享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石家庄市市庄村趙國遺址中出土了一批鐵、石、骨、蚌生產工具，鐵農具占65%。《史記·貨殖列傳》說：“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又說以鐵冶致富的蜀卓氏先人也是趙人。毗鄰的中山國以有豐富的鐵礦藏著於當世。邯鄲鐵器和宛、魯等地所產齊名，在戰國時期處於先進地位。《呂氏春秋·貴卒》說：“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中山的冶鐵技術也是先進的。公元前296年趙滅中山後，趙國的冶鐵業得到原材料和技術的進一步富足和發達。

中山國和趙、齊、燕三國相鄰，從出土遺存看，既有大量中原文化因素，又有一些草原文化的色彩，可以說是逐漸走上華夏化的道路。《史記·貨殖列傳》說：“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紆澤地余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大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按，意為椎殺人而劫掠其財物），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琴，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司馬遷又說到趙都一些情景：“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齊、趙設智巧，仰機利。……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如果說，司馬遷所形容描寫的趙國（包括中山）風俗，意味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音樂歌舞及相關人員的商品化或專業化，還不如說是趙國邯鄲等地政治經濟地理條件適

中，带有国际性；妇女游媚富厚之家，入于国王后宫，徧入诸侯，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同时两极分化严重，官僚豪门的享乐生活大量需要，也是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我国古代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社会上并未出现“第三次大分工”，社会结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广大温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②

1963年4月阳高县天桥村发现战国货币一万三千余枚，发掘简报附表具体数字一万二千枚，重达102公斤，其中属于赵国的二十四种，共计七千余枚；韩国的三种，魏国的六种，燕国的两种，东周君的一种，以赵国安阳布币为最多。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在赵地阳高、原平、太原、祁县、交城等地以及内蒙凉城，共出土约两万枚钱币；而建国后出土的东周钱币见于正式报导的达七万余枚，赵国占了约三分之一弱。这些现象说明赵国在三晋中以及同时诸国中商业贸易较为发达，赵国贵族官僚及其他豪门为了满足其政治、经济、军事与享乐生活对货币需要量的庞大。

赵武灵王击破晋北的林胡和楼烦，势力扩张到阴山足下，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疆域已达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平原及河套平原。内蒙古地区发现许多战国文物，较为重要的有1960年发掘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及凉城县双古城，都有赵国的遗迹和遗物。赵长城自呼和浩特市以东，经卓资县、察右中旗、集宁市、察右后旗、商都县、化德县与燕长城相接，当为古代伟大建筑之一。

赵国墓葬基本上也属中原文化系统。赵都邯郸西北发现五处墓地，分属今邯郸、永年二县，各自修筑在一个小山上，每处都有坐西朝东的陵台，一般长300米左右，宽200米

左右。东侧有宽数十米的道路直达岭下。每个陵台的中部，都有一两个高大的封土堆，长宽30—50米，高约10米。周窖村附近的一处陵台西北的墓曾作发掘，封土上有较多的板瓦和筒瓦，表明原来可能也像辉县固围村魏国墓葬那样建有“享堂”；墓室长14.5、宽12.5米，东西两端都有墓道，通长77米，东墓道内有车马坑，西墓道内有殉葬坑（殉二人）。邯郸和邢台发现的赵国中小型墓葬中，邢台较简单，邯郸百家村、齐村发掘81墓，多属战国中期或稍晚，墓坑一般长3—4、宽2—3米；墓主头向北和仰身直肢者占墓葬总数约三分之二；头向东和屈肢者各十余墓，有人殉者六墓，墓主和殉葬者均为仰身直肢，人殉多则三人，少则一人，M57的三个殉人中有一人头部饰十九粒水晶珠，身旁又置戈、矛各一件，当为墓主近幸，绝非所谓的奴隶殉葬，随葬陶器多施彩绘或饰暗纹，出现最多的组合是鼎一至三件，豆、壶各二件，盘、匜、碗各一件，并无明显规则，这类无规则殉器，同样出现于中原文化其他墓葬中。用秦汉时逐渐形成的丧葬上严格的等级制去解释和构拟周代墓葬的列鼎制等，似属附会，与历史实际并不吻合。这批墓中只有少数墓内戈、矛、戟、剑诸兵器俱全，还随葬有车马器和较多的玉器，他们几乎都有人殉。车马坑发掘六处，与其他墓地相比，形制有所不同，车和马分别埋在相连的两个坑中，埋马最多的一号坑有26匹，依次为14、8、4、2马，车的数目不清。

综合看来，今长城附近直到黄河在新石器时代存在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相应的似为存在了许多不同族属的氏族部落，他们分属三代所说的“戎”、“狄”、“北蛮”、“北夷”和“华夏”诸不同的共同体中，仍然过着采集、渔